

密教传持与宋代民间 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夏广兴 闫伟伟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汉魏之际,杂部密教经典已传译于中土。入唐以降,密教开宗立派,活跃于朝野上下,虽经“会昌法难”之劫而渐趋式微,但随着密教的世俗化已渐次深入民间,化俗流布。其中,民间流行的五色线习俗,即与民间传持的密教相互影响。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其发端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但入宋以后,密教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将其供奉主神之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由端午佩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考研这一习俗的历史演变,不仅有助于再现唐宋时期民间特殊的人文风貌,同时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密教;宋代;五色线习俗;阴阳五行说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2.009

有宋一代,佛教日趋世俗化,随着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影响,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僧人译经、开坛、法事、俗讲等活动的举办已经远远超出寺院的范围,许多佛事活动中都有官员、文人、百姓的积极参与。不少社会上层阶级人士亦信奉佛教,上行下效,社会上掀起了延请僧人、置办法事的热潮。一方面民众在操办寿宴、破土动工、乔迁新居、行业开张之时,本着祈福求吉的愿望,往往会延请寺院高僧前来念经咒、作法事;另一方面许多佛教节日亦受到普通百姓的热诚追奉,一些佛教习俗甚至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节日盛宴,如盂兰盆节、浴佛节等等。随着佛教在民间的流播,一些传统习俗中亦融入大量佛教元素,如五色线、祈雨习俗等即是^①。在这些法事、节庆当中,诵持大悲咒是其必备环节,也就是说,大悲咒通过融入佛教仪轨的方式,以法事为其主要形式,走入了千家万户。其中,大悲咒与五色线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色线是持诵大悲咒时为之加持护法的一个重要道具。它不仅在佛教中具有特殊意义,而且与中国传统五行学说有着一定关联。

一 五色线与阴阳五行说

五色线,又名五彩缕、五色缕、五色绳、朱索、百索、色绦等,其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五行学说历史悠久,“五行”一词可以追溯到现存最早史书《尚书》中。五行理论十分复杂,它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构成。五行相生相克,并分别对应五脏、五感、五音、五味、气候、季节等等。五行学说中有两个基本概念,名“五色”、“五方”。与五脏、五音等相同,它们除了与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一一相对应外,也可相互对应。五行学说之五色,也是白、赤、黄、青、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10&ZD104)及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规划项目(11YJA770054)阶段性成果。

^① 夏广兴:《唐宋时期佛教流播与祈雨活动的盛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黑。河上公注《道德经》有云,“五色有青、黄、赤、白、黑”^①。自春秋战国时起,“青、赤、黄、白、黑”作为五种正色,“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②“五色”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观念。与此同时,古人还将其与方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周礼》有云:“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③。在中国传统哲学表现中,东方为方位之首,春天为四季之首,所以将东赋予春。春天万物萌发,大地回青,即“春属木,其气青”。因而,东方主青色。又,南方主夏,夏属火,火为赤,得南方主赤色。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五行学说将季节与金、木、水、火、土五元素,“五色”之白、青、黑、红、黄,及“五方”之西、东、北、南、中一一对应,形成“五方色”理论^④。色彩与方位、季节的连接,体现出古代思想家“现象本体互融、体用不分”的一个特点^⑤,它其实是中国古代哲学对空间及时间的一种朴素认识。“五方色”流行很广,《说文解字》也深受其影响,它在解“青”、“赤”、“黄”、“白”、“黑”五色时,就有意识的将其与方位对应,分别以“东方色也”、“南方色也”、“地之色也”、“西方色也”、“火所熏之色也”释之。此外,在五行学说中,还有神话传说中的代表吉祥,有辟邪镇守功能的白虎、青龙、玄武、朱雀四灵兽与四方各色分别对应:白虎为金,守护白色,主西方;青龙为木,守护青色,主东方;玄武为水,守护黑色,主北方;朱雀为火,守护赤色,主南方;中央黄色为土。这样,五色就与五位及灵兽产生具体对应的关系。五方色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大,涉及哲学、军事、建筑、文学、武术、艺术等多个领域。从夏商周殉葬祭祀制、历代帝王陵墓修建、古代严格的丧葬仪礼,可以看出我国对死亡的重视。其中,司命主的属下“五岳卫兵主将”,俗称“五鬼”,其形容便是“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军事方面,五方色是我国古代军队令旗的颜色,李卫公兵法有云:“诸军将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东方木,黄中央土”。五方旗是军队平日训练、战时指挥的重要军备。此外,五方色还是福寿的象征。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⑦。五方色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公众认可的厌胜辟邪的功用。

二 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流播

五色线习俗的形成由来已久。早在汉代,就已有记载,据汉应劭《风俗通》载:“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缿,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此乃避邪之俗。同时,五色线还视为婚聘之礼。据郑樵《通志》载:后汉之俗,聘礼三十物者,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凰、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鸟、九子妇、阳燧钻,凡二十八物。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东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仪,不足书。^⑧至唐代,又有“婚礼,纳采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干漆九事”之说^⑨。可见,这种婚庆习俗沿袭至唐,长命缕作为聘礼这一习惯被完整的保存下来。长命缕本身并未有经济及实用价值,之所以长期作为聘礼,是因为其寓意吉祥。至于佩戴长命缕可以得良缘之说,也源自汉代。《西京杂记》中有戚夫人侍儿描述宫中奢华生活的记载,其云“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闾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羈,谓为相连爱”^⑩。这样的说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相关描写,其云: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

① 赵晓鹏、李安纲:《道德经》,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② 李零:《孙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页。

③ 陈成国点校:《周礼》,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104页。

④ 在这里四季其实为五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认为长夏分为“夏、季夏”两时。

⑤ 王文娟:《五行与五色》,载《美术观察》2005年第3期。

⑥ [宋]李昉等撰:《太平广记》卷三七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02页。

⑦ [唐]崔令钦撰、罗济平校点:《教坊记》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⑧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礼略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13页。

⑨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⑩ [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三,陕西: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①可见,在唐玄宗时期,宫妃曾仿汉戚夫人之雅举,在七夕时节,用五色线作乞巧之用。

宋代直承此俗,不仅曾慥《类说》卷六中继承了《西京杂记》中五色线相怜爱这样的说法,而且还出现欧阳公“楚俗传筒黍,江人喜竞船。深宫亦行乐,彩索续长年”这样的感慨^②。另外,宋代文学作品中女孩系带五色线求姻缘的描写非常多,如“菖蒲酒满劝人人,愿年年欢醉。偎倚,把合欢彩索,殷勤寄与。手把合欢彩索,殷勤微笑旃檀郎。低低告,不图系腕,图系人肠”等等^③。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五色线习俗深受开元天宝时期的影响,它的佩戴时节已经由“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缠臂,曰长命缕。以艾为人形,置户上辟恶”的端午扩大到七夕节^④。沿袭唐人五色线神树的传说,宋人笔记发展出五色线织锦的故事:如“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纆,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经纬,异锦纤罗,不假蚕杼”^⑤;又如因祇国献女功,“以五色丝内口中,引而结之,则成文锦”等等^⑥。在此,五色线其实已经被宋人看作是女儿展现“女功”的七巧线。也正是在宋代,五色线的时节生命被延长,开始从端午一直佩戴到七夕时节。五色线习俗至宋代,已经成为国家节庆,其发展程度已趋成熟。在历时数百年的时间里,五色线习俗信持范围的得以扩大化。与唐代相比,其信持功德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即由厌胜趋向姻缘。其主要表现为:宋代,在南方一些地区,它已经演变成女儿节。在传统习俗中,女孩们要在五月五日端午节,将五色线佩戴在手腕或脖颈上,宋代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女儿端午佩戴朱缕的描写,如“盘丝系腕,巧篆垂簪,玉隐绉纱睡觉”^⑦;“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⑧等等。按照当时的习俗,女孩戴上五色线之后,直到七月七日七夕节才可以将其剪下,并要抛挂在房檐上。传说,挂在房檐上的五色线会在七夕夜晚被喜鹊衔走,用于搭设牛郎织女相会所用之鹊桥。有的未婚女性还会专门选择有月光的晚上,在对月诚心祈祷之后,才将五色线佩戴在手腕上,希望它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姻缘。更甚的是,五色线作为良缘的承载者,经常被青年少女作为定情之物互相赠送,所谓“自结成同心百索,祝愿子更亲自系著”^⑨。

三 密教经咒与五色线习俗

密教传入中土,与中土民间习俗交融互汇,吸收了大量中土元素,如五色线习俗即是。密教所阐释的五色谓:“青、黄、赤、白、黑,童女所合”^⑩。据密教经典记载,制作五色线时,先要仔细选择上好的五色细缕,用香、净水清洗后,令洁净的童女自右向左将五色丝线合成一股,并加持五如来真言。五如来真言各持一色,为五如来色,分别为“大日佛加持白色、宝幢持赤色、花开敷持黄色、无量寿持绿色、鼓音佛持黑色”^⑪。白色代表大日佛,它是一切众生的本源,是最初、最洁净的颜色;赤色代表的是宝幢如来,“既发菩提心于明道中,降伏魔怨灭除盖障”^⑫;黄色代表开敷华王如来,“以成正觉时,万德开敷皆到金刚实际”;青色代表无量如来,“既到金刚实际,即以加持方便,普现大悲曼荼罗,如净虚空中具含万像”;黑色代表鼓音如来,“本者即是如来自证之地,住大涅槃;若舍加持神力,则一切心量众生非其境界,是故其色幽玄”。五色分别代表五如来,五如来又各自显神通,护持佩五色缕者。有佛偈曰:“行者次于中,定

① [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

② [宋]欧阳修著,张春林编:《欧阳修全集》卷二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③ [宋]张耒撰,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67页。

④ [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⑤ [宋]李昉等撰:《太平广记》卷三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56页。

⑥ [宋]李昉等撰:《太平广记》卷二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28页。

⑦ [宋]吴文英撰,陈邦炎点校:《梦窗词》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8页。

⑧ [宋]周邦彦撰,李永宁点校:《片玉词》卷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⑨ 唐圭璋主编:《全宋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60页。

⑩ [唐]输波迦罗译:《苏悉地羯罗经》卷二,《大正藏》第18册,622b。

⑪ [唐]一行撰:《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五,《大正藏》第39册,627a。

⑫ [唐]一行撰:《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六,《大正藏》第39册,643c。

意观大日。……东方号宝幢,身色如日晖。南方大勤勇,遍觉华开敷。金色放光明,三昧离诸垢。北方不动佛,离恼清凉定。西方仁胜者,是名无量寿”^①。与之前五色对照来看:白色代表大日佛,居中;赤色代表宝幢如来,居东;黄色代表开敷华王如来,居南;青色代表无量寿如来,居西;黑色代表鼓音如来,居北。如此,在佛教中,五色线的白、赤、黄、青、黑五色可以分别找到五位守护佛,并分别对应五个方位。

有唐一代,密教已融入五色线习俗之中,并赋予诸种现世利益,如“若患鬼病加持五色线索,当使佩之即便除差。”^②“若亦立门书着气病者,当额书七鬼神名字,复取五色缕线,各各结其名字系着门上,大吉祥也。”^③这类宣说在密教经典中习见。尤其是作为密教重要表征之一的持咒,在五色线习俗中结合的较为密切,如“诵此咒三遍,缕五色结作二结系项。此陀罗尼,四十二亿诸佛所说。”^④五色线与密咒结合有诸多现世利益,如可疗疾、驱鬼等。“复有大鬼神王,名旃檀干闥婆,于诸鬼神最为上首。当以五色缊,诵此陀罗尼,一遍一结,作一百八结,并书其神鬼名字,使人赍此书缊,语彼使言:‘汝今疾去。’行速如风,到于四方,随彼十五鬼神所住之处,与旃檀干闥婆大鬼神王,令以五色线缚彼鬼神,勿烧众生,兼以种种美味饮食、香华灯明及以乳粥供养神王。”^⑤“若行此法,须五色缕线咒作七结。若痛,从头下先系顶系脚手,令火急之,咒水三遍喂之,即差。”^⑥在诸经咒中,大悲咒最为抢眼。

有唐一代,译经事业十分兴盛,其中包含有大量密教经典,如玄奘译《不空罽索神咒心经》、李无谄译《不空罽索陀罗尼经》、菩提留志译《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智通译《千手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一大批有关观音经咒的传译,从而使得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不空罽索观音、如意轮观音菩萨等诸密教观音受到不少民众的追崇,尤其是大悲观音信仰在民间迅速传播^⑦。在诸密教经咒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大悲咒了。“大悲咒”亦名“大悲神咒”,出于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俗称《千手经》,为密教重要经典之一。千手经源于持明密教,它是大悲观音信仰的根本经典,是中国佛教与民间信仰中流传最广的经咒之一。御制《大悲总持经咒·序》言:“世间善男子、善女人、一切众生,秉心至诚持诵,佩服此经咒者,种种恶趣,种种苦害,咸相远离,咸得圆融,超登妙道。”^⑧该经称,观世音菩萨在过去“无量亿劫”时,于千光王静住如来处闻此“大悲心陀罗尼”,经言诵持此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纵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若侵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师忏悔,始始除灭。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师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一切十恶、五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寺、偷僧祇物、污净梵行,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⑨于是,乃发誓“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身上即时长出千手千眼,悉皆具足。

大悲咒在当时广大的佛教信徒中广为流传,在文学创作中也必将留下印证,而小说作为最接近民众生活的俗文学,受其影响也是首当其冲。大悲咒的流行在当时的文人笔录中可窥一斑,如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续集卷六有“翊善坊保寿寺”条,就有云“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⑩;宋洪迈的《夷坚志》中甚至还有一位“日持大悲咒百八遍”的“平江僧慧恭”^⑪。诸如此类的例证在各代的文人笔记中多不胜数。同时,大悲咒的流行对当时的民俗发展也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从唐宋时的正史、方志、

① [唐]善无畏共一行译:《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卷一,《大正藏》第18册,5a。

② [唐]阿目佉译:《佛说不空罽索陀罗尼仪轨经》卷上,《大正藏》第20册,436a。

③ 《佛说却温鬼神咒经》,《续藏经》第2册,861a。

④ [晋]失译人附晋录:《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一,《大正藏》第21册,538b。

⑤ [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大正藏》第19册,742a。

⑥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六〇《咒术篇》第六八,《大正藏》第53册,743a。

⑦ 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诘与观世音》,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⑧⑨ 《大正藏》第20册,105c、107a。

⑩ [宋]李昉等撰:《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29页。

⑪ [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甲志卷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9页。

小说、诗词等文献资料来看,一方面,大悲咒利用自身功德殊胜的优势融入多种佛教节日中,随着佛节扩大为民节,融入当时的民俗当中,如盂兰盆节、圣诞会、祈祷会等等。在对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之后,可以发现:一方面,大悲咒的弘传为唐宋小说提供文学创作题材、丰富文学创作风格。另一方面,通过小说中故事情节的描写,很好地考查出大悲咒对当时风俗的影响,同时也再现出唐宋时期特殊的人文风貌。

大悲咒本身就吸收了五色线习俗的五色线元素,作为其仪轨法具。据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有记观世音菩萨传大悲咒法,有告梵天云:“诵此咒五遍,取五色线作索,咒二十一遍,结作二十一结,系项”^①;或“咒五色线二十一遍,围绕四边为界,皆得”的方法为施大悲心法作结界^②。之后,又对五色线的良缘功能进行加持,从而使得五色线习俗从端午节延续到七夕节。从中可见,大悲咒的弘传对民俗的重要影响。对比大悲咒五色线之“五色”与五行之“五方色”,可以发现二者惊人的“巧合”。首先,两者“五色”完全相同,皆为中国传统的五种正色——白、青、黑、赤、黄。自然界颜色多种多样,仅彩虹就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而五色中除去白天黑夜这两种最基本的色彩,剩下的青、赤、黄三色又不具备诸如“三原色之红、黄、蓝”等特殊含义,其选择就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中国之所以认为白、青、黑、赤、黄为五种“正色”,是汲取本土特殊的历史文化而生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自发选择的结果。显然,印度无论是气候季节,还是人文风情都与中国大不相同。如果印度佛教的五色线,选取释迦牟尼成道时圣体所发“红、黄、白、橙、蓝”之五色,似乎才更为合理。其次,两者的五色理论都与方位相关联。中国传统之五色受五行学说的影响,与方位紧密结合,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五方色。再观五色线之五色,由上文可知,其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也有对应关系。最后,两者都有相应的守护神。五色线之“五色”有大日如来、无量寿如来、鼓音如来、开敷华王如来、宝幢如来,五如来的守护;而五方色有东之青龙、西之白虎、南之朱雀、北之玄武,四神兽的镇守。二者都有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神”的守护。这三种“巧合”层层叠加,便不能再称之巧合。考虑到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源于上古夏商周时期,其产生时间远远早于大悲咒之五色线。可以推断,大悲咒的五色线是将佛教教义与中国五行学说融合而成的。

由上文中可知,大悲咒五色线的外在形态及其表义与五行学说有惊人的一致性。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五色线习俗的丝线颜色本身即是取自五方色。而大悲咒之五色线也是受当时流行的五色线风俗而来。比如,大悲咒五色线的功能、佩法又与五色线习俗非常相似。佛经中有云“若加持五色线二十一结,安悉香熏。鬼病者佩则得除差”^③。这与五色线习俗的“辟兵及鬼,令人不湿病”一致。并且,佛教佩戴五色线的方法是系在手臂上,如“阿闍梨先自取缊三结,作金刚结。用系左臂,护持自身,次一一为诸弟子系臂”^④。虽然之前佛教不乏“系颈”者,但从数量上来,后来者或出于方便故、或受民俗影响,还是系之于手臂的现象更多,这就又与五色线系臂的习俗表现出一致性。因而,无论是从五方色来看,还是从五色线佩戴习惯上来看,大悲咒之五色线来自民俗无疑。

此外,大悲咒对五色线习俗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纵观五色线发展的历程,在汉唐时期,五色线一直是端午驱邪之吉物;唐玄宗时期,宫妃仿汉,五色线开始作为乞巧之线;宋代,五色线变为女子求姻缘之物。可见,在玄宗之后,五色线开始与七夕节相连接。且在此之前,汉代已露此端。那么,在汉武帝至唐玄宗,八百年左右的时间中,五色线为何停留在端午时节,而直到宋代才正式沿用到七夕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唐宋此俗之差异,源于大悲咒的流行。如上文中所述,唐代盛行的端午五色线习俗,促使佛教将民俗之五色线加之佛教教义,用作大悲咒等密咒的诵持仪轨佛具。大悲咒将民众熟知的五色线融合吸纳,使之成为自身诵持的法具,无疑为其传播打开方便之门。这实质上显示出的是大悲

①② [唐]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卷一,《大正藏》第20册,108c、109b。

③ [唐]菩提流志译:《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卷一,《大正藏》第20册,284b。

④ [唐]一行撰:《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五,《大正藏》第39册,627a。

咒为适应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快速融入唐代社会而做出的自身调整。此外,大悲咒还将自身功德赋予五色线,其中一项便与姻缘有关。在诵持大悲咒的时候,会先进行请神仪式,其中有“一心奉请,南无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摩诃萨”^①。然后,观自在菩萨为众神诵念大悲真言,“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②。在诵持完大悲陀罗尼后,又有“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益其效验”^③。可见,月光菩萨便是大悲咒供奉的主神之一。而月光菩萨就是民间最为流行的月神的别称,也是女性拜月习俗中所供奉的主神。因而在唐代,大悲咒先将五色线吸收入其修持仪轨,然后再将自身求姻缘的功用赋加其上。随着大悲咒的流行,至玄宗时期,宫妃首先在七夕时节再次启用五色线。至晚唐五代,佩戴五色线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延伸,其佩戴时间也并不局限于之前的端午时节,而是延长到七夕节。由此发展至宋代,五色线终于成功得将端午节与七夕节联结在一起,脱离了仅仅是端午节吉物的身份,其角色功能也完成由厌胜到求缘的转变,成为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民间习俗。

在唐宋五色线习俗发展的背后,同时也暗含着大悲咒的进化过程。大悲咒自初始传入唐朝,便一直寻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唐代是传经、译经、开坛等佛事活动兴盛的朝代,它为大悲咒提供良好的流播环境,但大悲咒并未因外界形势大好而停止自身发展。大悲咒虽出身密宗,但不局限于密宗;大悲咒出于佛教,但其却将民间作为其用武之地。首先,大悲咒以其殊胜的功德快速融入佛教仪轨当中,它一方面随着民间法事的操办流入千家万户,另一方面在佛俗民节中大展拳脚并由此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大悲咒还对传统民俗进行积极渗透,五色线习俗便是其结果之一。将五色线“拿来”用于自身仪轨法具,也体现出其迫切希望融入唐朝社会的需要。引入五色线这一民俗道具后,大悲咒又凭借自身功能的殊胜,赋予五色线新的涵义。被大悲咒改造过的五色线,在民间发展中成功延长了其节庆寿命,跳出端午时限的束缚,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习俗。纵观整个五色线习俗的演变过程,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大悲咒对中国传统文化“吸收——改造——影响”的过程,是接受与反接受的互动,体现出大悲咒自身发展的一个良性循环。

四 结 语

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这在许多文献中有所反映。五色线习俗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其中,五方色是五行学说的重要理论之一。它由五种颜色组成,即“赤、青、黄、白、黑”。其次,它将“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配以“青、赤、白、黑、黄”五色,并以“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四神兽予以守护。而将这五种颜色的丝线拧成一股,便可制成五色线。对于大悲咒而言,五色线是其诵持的必备法具。笔者认为,大悲咒之五色线之所以是赤、青、黄、白、黑五种方色,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其另有五位如来守护,并与方位具有对应性,这充分说明了大悲咒之五色线来源于五方色。同时,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将其供奉主神之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由端午佩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可见,关于大悲咒与唐宋民俗关系的考察,对研究唐宋社会、历史、宗教具有一定意义。

(责任编辑 唐忠毛)

① [宋]知礼撰:《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卷一,《大正藏》第48册,974a。

②③ [唐]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卷一,《大正藏》第20册,111b、108a。